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5.01.001

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余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主体;政府治理结构;政企分开;国资委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1-0001-09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资本输出为典型特征的旧帝国主义走向了以纸币和国债等白条输出为典型特征的新帝国主义,发达国家的金融寡头对于政治经济的直接控制力大大增加,于是,削弱国家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政府的作用受到限制,大资本家所属企业通过获得一些政府垄断领域的“国民待遇”资格,而将公共权力转归私用,政府的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

一、私人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私人部门是指企业和家庭,该部门是以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和目标的。^[1]这样一来,大资本家与普通工人就被归在一起,阶级差别就被取消了,阶级差别所造成的需求差别和行为差别(供给差别)也被取消了,无产阶级就被资产

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掩盖了。其实,这些差别是十分巨大的。例如,工人远不像资本家那样看重钱财。“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者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而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神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拜金者’。因此,对金钱没有这种敬畏感的工人,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钱袋。”^[2]

正是从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出发,西方公共经济学认为,私人部门若想成功地提供某些公共产品,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私人部门提供的公共

* [收稿日期]2014-12-01

[作者简介]余斌(1969—),男,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产品一般应是准公共产品,或者是公私混合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例如某些国防产品可以由私人部门生产,但须由政府通过采购来提供。二是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必须存在排他性技术。西方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从17世纪开始,在英国,灯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因此,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也是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和经营的。但是,在科斯的灯塔中,进入港口的船只必须交纳灯塔税,港口成为一种排他性技术。三是要有制度保证,尤其是产权。^[1]

由于产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因此,私人部门在这三种条件下所提供的产品都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符合西方公共经济学规定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特性。换句话说,在这里,私人部门并没有提供公共产品,至多只是提供了准公共产品。而政府为了私有产权所有者的收益去向其他人群强制征税,是典型的公器私用,是把国家的权力转移给私人(利益集团)。

此外,私人部门生产国防产品与供给国防这样的公共产品并不是一回事,尤其是当这些国防产品有可能会卖给敌对国家时。例如,在列宁所摘录的布雷斯福德的《钢和金的战争》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德国公司在重建作为德国海军敌手的俄国舰队。不列颠公司在意大利设有分公司,这些公司建造的正是人们称之为我们的敌手的意大利无畏舰。所有主要的武器制造公司——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都加入了诺贝尔托拉斯,不久前还加入了哈维公司。有一段时期,法国的施奈德公司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联合成一个辛迪加,来开采阿尔及利亚温扎的铁矿。”^[3]而德国与俄国、英国与意大利、英国与德国、法国与德国、美国与德国在当时恰恰是互相敌对的,并在那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得死去活来,在资本的驱使下各自都死伤了大量的民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就完全不能提供或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①“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在兰开夏郡开凿了从桑基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

利开凿了第一条有重要意义的运河,即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默西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渡槽越过艾尔韦尔河。由此,英国开始了运河建设,而布林德利成为了第一个重视运河建设的人。现在人们已经开凿了许多运河,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200英里运河和1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好几条运河。这些工程,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人 and 公司修筑的。”^[2]之所以由资本家来修建运河这样的公共设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封建国家还不知道要为资本家服务,“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2]。而在市场经济中,作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货币掌握在私人手中,从而使得社会权力成为了私人的私有权力^[4]。这样私人就有可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社会权力来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家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当时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而修筑运河和公路,可以大大促进贸易活动。

这也就是说,资本本身——假定它拥有必要的数量——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用来修筑道路,即修筑道路对于生产者来说成为必要性,特别是对于生产资本本身来说成为必要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条件。公共产品虽然没有交换价值或不是价值,但这并不排除它可以像良心一样在形式上具有价格。^[4]当然,这些情况的前提是,交往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缺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障碍已经可以充分感觉出来,从而使得资本家能够有足够的收益来分时分阶段地偿付道路的生产费用。如果所有一般生产条件,如道路、运河等,不管它们是使流通易于进行,还是只有它们才使流通成为可能,或者是使生产力增长(例如在亚洲的水利工程,以及欧洲由政府兴建的水利工程等),都要由资本而不是由代表共同体本身的政府来兴建,那就首先要求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有极高的发展。一个国家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很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

① 在这里,公共产品是指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没有交换价值或不是价值的使用价值;公共物品是指人们生来就有权享有的东西。

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5]这样一来,如果公共产品由资本家私人提供,那么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由国家提供,那么资本家同样有利可图,因为他把负担转嫁给了别人。这也说明每个人对于公共产品的享有是不平等的,资本家是最主要的享受者。

事实上,中国铁路部门曾经被攻击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垄断堡垒”,被要求向私人资本开放,打破铁路垄断。四川省规划的川南铁路也曾经以首例没有铁路总公司入股、由地方资金和私人资本组成的地方城轨铁路这一建设设想而名噪一时。但是,川南铁路吸引私人资本的愿望落空,川南公司最后不得不希望铁总能够入股以解决资金问题。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如果单纯以建成后的运输收入来招揽私人资本入股,效果会很差,因为铁路投资周期长、资金大、回收慢、且收益率不高。因此,为了让私人资本参与进来,他要求将公共所有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周边用地的综合开发权、矿产资源特许经营权等剥夺给私人资本,还要求地方政府向私人资本提供运价补助、贷款贴息等。^[6]若真的按此办法实行,四川民众该承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实际上,在有牟取暴利的可能性时,资本家也会主动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前提是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拥有垄断地位,使其可以凭借垄断权或产权来勒索民众。前面提到的科斯的灯塔税就是一例。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在改革的幌子下,一些公共设施,如自来水厂、道路交通等,被私有化到私人尤其是外资手里,从而当地的民众不得不承受价格高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

例如,深圳的梧桐山收费隧道是深圳第一条以BOT方式建设的市政工程。即由企业投资建设、运营,并且获得收费权,在与政府协商的年限到期后,将项目归还政府。1997年隧道开通后,原有的不收费的盘山公路被政府放弃维护而关闭,收费的隧道成为通过梧桐山的唯一通道^①。隧道公司享有梧桐山隧道30年的收费权,一直到2027年。车辆通过隧道,要收费10元以上,而由此造成的堵车、收费等

原因,使得深圳市盐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的瓶颈。从1996年开始至2011年,每年都有市、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罗湖、盐田以及深圳市的“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提案,要求取消梧桐山隧道收费。深圳市政府也希望能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收回隧道,不再向车辆收费,但企业方不同意收回,开出的价格也让政府很难接受。这就使公众的民主意愿、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受挫于私人利益。直到新的公共产品出现,即2008年7月深盐二通道通车,以及作为盐田港疏港通道的盐排高速等建成后,梧桐山隧道的车流量明显下降,资本家无利可图后,才将大大贬值的产权按高出贬值的价格转让出来,使梧桐山隧道得以取消收费,成为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7]

事实上,西方公共经济学也承认,私人部门取得某一(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权利后,可能会形成某种垄断优势。私人部门的这一垄断优势,可能会导致出现以下问题:提高此(准)公共产品消费的准入价格;不对消费者提供完全信息,从而欺骗消费者;在(准)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任其产生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针对上述问题,政府有责任对其他主体参与公共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规制,以切实保护社会公共利益。^[1]

在日本,建筑抗震报告书曾经必须经过各地建筑主管部门检查确认,但1999年以后,日本政府放宽了限制,一些由政府指定的、符合资质要求的民间机构也开始承接这一业务。然而由于建筑业竞争日益激烈,部分民间机构为了争揽业务,在检查、确认建筑抗震报告书的过程中往往只是走过场,敷衍了事,导致建筑设计师和开发商联手对高层建筑设计数据造假以及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等恶性舞弊事件。^[8]

由此可见,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由私人部门来提供西方经济学的准公共产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损失可能会远远大于由政府部门来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既然如此,那么非要由私人部门来提供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理由,就只有向资本家即利益集团输送利益了,以帮助资产阶级更方便地剥削人民群众。

① 用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术语,这就是说,公共产品不再提供,只提供准公共产品。

事实上,私人部门因追逐私利形成的污染环境、造成工伤等行为,往往会成为需要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的原因。2007年6月,一幕现代包身工的悲剧被曝光。上千名不满14岁的孩子被人用数百元的价格卖给私人资本拥有的山西黑砖窑。此案最后惊动了中央领导,而地方政府还要动用公共的财政资金去替私人资本家补发工资和发放慰问金,并出资追捕逃跑的工头。^[9]

尽管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一般是不可能违反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本性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否则西方经济学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基。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眼界之外,也的确有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例子。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国民党军队不抵抗就撤入关内后,关外民众的自发抗日行为就为关内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部分的国防。但是,这样的公共产品由民众自发提供,其代价还是太大了,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二、第三部门和社区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第三部门是指除了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之外的社会部门,其称谓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独立部门、志愿者组织、慈善部门、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第三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既然私人不愿或者不能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只好由其他部门或组织来完成这项任务。二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失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缺陷是第三部门兴起的现实原因。三是所谓自由主义的重新兴起和公民自觉意识的觉醒。^[1]

的确,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失灵或不作为,比如对环境保护不力,是催生像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主要原因。而这些第三部门也的确在弥补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对于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方面作出了贡献。在俄国革命前的1906年,沙俄政府的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请求国家杜马拨款5000万卢布救济饥民。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杜马的决定,大臣们就不能得到这笔钱,就不能把粮食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不能容许把钱交给专制政府,国家杜马应当成立自己的粮食委员会,派自己的成员到发生

饥荒的地区去,吸引一些“自由的社会组织”,也就是第三部门,参加工作。社会民主党还痛斥沙俄政府是窃取人民的钱财并用来同人民作战的“制造饥荒的真正罪人”。^[10]

但是,第三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也存在较多的问题。第一,第三部门的存在,纵容了政府部门推卸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第二,由于第三部门自身实力的不足,以及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随意性较大,不能使公共产品得到足额和公平的提供。第三,根据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西方经济学“公理”,第三部门的行为绝不会是无私的,而往往会按其经费提供者的自私意图行事,从而有可能妨碍公共利益。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西方一些国家的基金会等第三部门早就成了这些国家颠覆其他国家的工具。^[11]它们为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提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产品”。第四,由于政府本身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和关注点,因而政府所受到的监督反而远比第三部门多,而在监督不足的情况下,第三部门在自身的运作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效率远没有西方公共经济理论所想象的那么高。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全美最差劲的50家慈善机构,管理费所占比例均超过了70%。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这50家慈善机构的项目只将他们所筹善款中的4%用在了救助对象身上。有一家糖尿病慈善机构总共筹集了1400万美元,但只给了病人大概1万美元;最夸张的是,还有6家慈善机构甚至压根就没在项目开支上花过任何钱。^[12]

社区,如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作为活动区域,它不可能是什么主体,但是,在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的需求而有可能结合起来共同进行公共经济活动。这样被组织起来的包含有人群活动的社区,就可以当成一种特殊的第三部门,而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

西方公共经济学认为,社区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特点在于社区公共产品的生产是基于生活聚集区的居民的实际需要,由居民根据协商原则集资完成,居民缴纳的资金并不出于利润的目的。社区具有自愿基础上的契约性。^[1]但是,作为公共经济主

体的社区属于自发组织,没有经费和酬劳,也没有稳定的组织和人员,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十分有限。例如,在中国城区,如今最典型的社区组织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作为开发商、物管公司与业主沟通的“桥梁”,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业主委员会的缺失,众业主无法实现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平等对话,经常不得不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维权抗议。

三、黑社会组织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黑社会组织一般被看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它们又如何会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之一呢?其原因就在于,公共经济活动也是具有阶级性的。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其实是不可缺少的。鼓吹自由、平等、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固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残暴工具,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抗争和国际舆论面前,这种压迫不能过于赤裸裸。因此,在国家机器不便替资本家出头的地方,黑社会就粉墨登场了。这也是那些国家虽然在法制上致力于打击黑社会,但是放纵统治阶级和黑社会的“无罪推定”法则,仍然是那里的黑社会兴旺昌盛的原因。

据揭露,在日本政治家中,与黑社会势力有来往的不在少数。而且,从政治家到企业到一般市民,都在利用黑社会。在泡沫经济全盛时期,哄抬地价的 90%,高尔夫球场开发的 80%,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的 70%都是由黑社会或其公司干的。那时一些城市银行、地方银行、大型不动产公司、信用社等都在有意无意地借助黑社会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某大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个黑社会分子,此人在泡沫经济时期专帮不动产公司做拆迁工作。当某不动产公司相中一块土地,打算收购来盖成公寓出售或出租时,往往会碰到土地所有者不愿出售的情况,这时不动产公司便会找他,由他出面去同业主交涉。而他的办法无非是黑社会那一套威胁骚扰,想方设法让那业主日夜不得安宁。日本的权力机关一方面将黑社会列为必须排除的对象,一方面却又容忍其存在,因为他们觉得黑社会有可以利用的价值。^[13]也就是说,黑社会可以给他们提供公共产品。

199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长达 705 页的档案,根据解密档案和古巴安全部门统计,迄今为止,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曾遭受到 634 次暗杀,其中的一些暗杀就是美国政府背后支持黑社会来进行的。例如,1960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阿兰·杜勒斯密会佛罗里达州两大黑手党当家萨姆·吉安卡纳和桑托·特拉菲康特。几个星期之后,曾经在黑社会中作过卧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马胡,接到中情局的调令,开始与黑手党频繁接触。他的联络人是迈阿密黑社会的头目——约翰·罗塞利,企图对卡斯特罗下毒。^[14]虽然暗杀行动没有成功,但它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法制社会也离不了黑社会。

有鉴于此,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将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黑社会组织定义为:以违反当事国法律的方式为当事国统治阶级服务的非政府暴力组织。它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为自己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也是为什么黑社会往往会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保护伞的原因。而那些并不能为统治阶级所容忍的暴力组织,如恐怖组织,则不定性为黑社会,而定性为有组织犯罪集团。

四、国际组织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看来,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就是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消费群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是国家间生产专业化分工过程的衍生物,是国家间专业化过程中为了协调、承担分工利益的产物。主要包括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维持这些体系为责任的国际组织、商业仲裁机构、和平维持机构、国际法及其准则,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集体行为、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红十字会,邮政、电讯等方面的统一标准以及相应的维持性的国际机构,国际互联网等。^[1]

事实上,国际组织的出现与国内政府出现不同,前者并不是什么分工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5]因而,也

就需要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维护这套秩序的机构。

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16]这种大资本家的国际联盟,既是他们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他们的国际公共经济主体。

很显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必然导致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首先操控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掌握在听命于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手中。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坦率地承认了他的经济杀手身份后指出,经济杀手从世界各国攫取的数以千亿计的金钱,正是通过世界银行和美国国外的援助机构等国际组织,装入到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中。^[17]

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如各种商品的生产标准、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等,也掌握在受欧美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手里,成为发达国家谋取私利和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重要工具。

随着全球治理的呼声的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试图强化他们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国际公共经济主体地位,以维护自己的霸权,而发展中国家则试图成立自己的国际组织,公正地为自己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据报道,2014年7月15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这两个各拥有1000亿美元的金融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减少发达国家利用他们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角。

对于工人阶级而言,马克思领导和创办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但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在欧洲资产

阶级政府的联合压迫下被解散了。列宁创办的共产国际,是另一个服务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国际组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也被英美资产阶级政府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为要挟而解散了。

五、劳动者组织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者属于被剥削阶级。资本家可以依靠政府,工人只能依靠自己。“厂主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有整个厂主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取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工人同样也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不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的生活的权利。工人同样也认识到,他们也需要整个阶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此就必须争取到对国家政权的影响。”^[18]

实际上,既然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议会内的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15]“工人群众绝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共事务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19]更何况,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0]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会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15]限制工作日这种事情,在英国像在其他各国一样,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从外部经常施加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绝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20]

在沙皇俄国,政府也只是在工人的压力下才放弃旧的工厂制度。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波兰的罢工事件促使罚款法在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罗兹城在彼得库夫省)得到推行。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赫卢多夫纺织厂的大罢工立刻促使罚款法在梁赞省得到推行。事情很明显,在工人自己没有干预的时候,政府也“自认无权”剥夺资本家老爷不受限制地(任意地)罚款的权利。^[18]

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政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劳动者的自身组织也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列宁指出,“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21]他还指出,“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21]

六、公有制经济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原始公社里,全体成年男女社员的会议通过各项重大决议,对公社成员进行审判,对比较重要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作出决定^[22]。这时没有政府这样的公共经济主体,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是公社这个公有制经济组织。

显然,公共经济离不开共同体的存在。“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由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因此,使共同体成员平等参与的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真正的公共经济主体。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只有公有制经济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合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就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并且颇有成效。所有共产主义移民区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变得非常富裕,他们想要得到的应有尽有,而且比他们能够消费掉的东西还要多。^[23]共同生活的人花费的劳动比较少,而生活得很好,他们有很多空余时间用于智力的培育,同他们那些保留私人财产的邻居相比,他们是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所有这一切,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很多德国人已经认识到了。所有国家都有一些人传播这种学

说,并宣称自己是公有的拥护者。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说这件事情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那么,它对一无所有的穷苦工人就更是重要,他们今天挣得的工资,明天就花完,并且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没有饭吃。这里展现在工人面前的前景是:独立的、有保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且同那些现在靠自己的财富把工人变为自己的奴隶的人完全平等。^[23]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指出,“我们不是走向旧时那种必然使人们无知、贫困和涣散的个体经济,而是走向公共的协作制的大经济。那时人类科学、人类技术的一切成就,一切改进,专家们的全部知识,都要为联合起来的工人服务。工人应当主宰一切,应当学会自己管理,学会管理那些一直替资本家当奴仆来反对工人的人”^[24]

列宁在称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的创举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25]

列宁还设想,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大大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那么就可以实现这样一项任务:“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体力工作 6 小时,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 4 小时。”^[26]只有实现这样的任务,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才会使得其他一些主体完全多余。

七、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向支持鼓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寡头,不愿意承担应负的责任,将球又踢给政府,说什么对金融和房地产业监管不力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27]。

事实上,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为了消减工人曾经通过奋斗获得的福利待遇,压制 99% 的人使其无法反

对1%的人,也不能不强化政府的权力。西方国家在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同时,却对本国公民加强了电话和网络的监听监视。

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20] 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既要靠党和政府,也要靠13亿人民。”^[28] 他在谈到为民办实事时还曾指出,“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广大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群众真正成为选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有的事还要成为行动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事可以不是由政府直接来办,要从扩大就业、应对老龄化、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活型服务业,办好为群众服务的组织或企业,为更多的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通过鼓励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为群众解忧,实质上也是为党委、政府分忧。同时,要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实事项目建设,形成人人参与办事、人人得到实惠的良好局面。”^[29]

当前,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政企不分。邓小平曾经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30] 然而,只要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仍然是各级政府的直接下属单位,就谈不上政企分开,同时各级政府也容易被诟病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另一方面,在各级政府直接管辖各级国资委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处置,也会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严重影响各级政府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因此,应当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有助于使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上来,理顺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机制,释放政府活力,“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便于转变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便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各级政府一视同仁地对待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做好裁判员,最终便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各级人大作为人民的代表,管理属于人民的国有企业也是其应尽的职责。

[参考文献]

- [1] 黄恒学.公共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5-76,87,81-83,78-79,84-86.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8-439,401,571.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5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27-728.
- [4] 列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54-156,123.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9.
- [6] 川南铁路获铁总入股 引民资设想落空[EB/O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704/12653239_0.shtml, 2014-8-3.
- [7] 深圳:梧桐山隧道取消收费 预计4月起免费通行[EB/OL]. <http://www.cntour2.com/viewnews/2011/2/28/02-28144542.htm>, 2014-8-2.
- [8] 日本豆腐渣工程震惊全国 东京很多楼不抗震[EB/OL]. <http://money.163.com/05/1130/11/23Q6HCJM00-251LDK.html>, 2014-7-31.
- [9] 山西洪洞黑砖场案惊动中央 王兆国亲笔做出批示[EB/OL]. <http://news.sohu.com/20070614/n250560105.shtml>, 2014-8-3.
-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51-253.
- [11] 揭秘美国伪智库:手握“软刀子”专门搞颠覆[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2/26/content_7317192.htm, 2014-8-3.
- [12] 美国黑心慈善调查:一机构筹款1400万只给病人1万[EB/OL]. http://news.ifeng.com/shendu/ndzk/detail_2013_07/08/27257913_0.shtml, 2014-8-3.
- [13] 胡俊凯.日本名门企业与黑社会联手内幕[J].世界经济,1997(3).
- [14] 卡斯特罗传奇——被美国暗杀634次[EB/OL]. <http://news.163.com/10/0903/05/6FKPPT1M00014AED.html>, 2014-8-3.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516,40-41.
- [16] 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81.
- [17] 约翰·珀金斯.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作者自序.
- [18] 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7-78,60.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7.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6,75,197.
- [21]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7,372.
-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
-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1-222,236.
- [24] 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
- [25] 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
- [26] 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1.
- [27] 国际财经早报:美联储主席称美对金融和房地产业监管不力是造成金融危机重要原因[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3/23/c_111692414.htm,2014-8-4.
- [28] 习近平在北京市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相关活动纪实[EB/OL].http://www.gov.cn/ldhd/2012-11/30/content_2279917.htm,2014-2-22.
- [29]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46.
- [3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2.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Diversification of Public Economic Entity and Reform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YU Bin

(Department of Marxism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Neo-liberalism and Public Economics has emerged since 1970s in 20th century. Public economic entity diversifies gradually and there is a transformation of “let markets rip” o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West. Private sectors, the third sectors,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ll become public economic entities, even gangdom organizations provide public product to capitalist class as well. However, labor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 sectors are main bodies of public economy besides government sectors. As long as government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of capitalist class, economic crises are inevitable no matter how i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transforms, by contrast only socialist countries can transform administration system relying on the masses to ensure state functions limited within several universal and national functions. It’s relatively important to separate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a systematic way putting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t the same level from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Key words: Public Economics; public economic entity;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enterprise management;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